

## “四大名旦”相聚华西坝（一）

金开泰

1942年燕大在成都复学，代理校长梅贻宝，费了不少心思，请到了陈寅恪、李方桂、肖公权、吴宓，被人们戏称为燕大的“四大名旦”，直到晚年梅还认为是主持燕大时最重要的建树，“不但燕大学生受益，学校生辉，即是成都文风，亦且为之一振。”

### “教授的教授”陈寅恪在华西坝



1943年夏天，陈先生是作为成都燕京大学教育部特聘教授来蓉的。开课之时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在学校的周会上说：“我校迁徙西南，设备简陋，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执教。陈先生业已到校，即可开课。这是学校之福。”在成都期间曾兼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。

#### 陈寅恪其人

陈寅恪，字鹤寿，江西义宁州（今修水县）人，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。他先后在欧美等国第一流大学经考试录取，读了10几个博士课，却不拿半个学位。到成都之前，陈先生早已是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。1927年，陈寅恪在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就明确宣告：“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，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。呜呼！树兹石于讲舍，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节，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者也，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；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”。他的行为也让人敬仰，在避居香港遭日本占领后，1941年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，1942年春，有人奉日方之命，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，均遭他拒命，随即出走香港，取道广州湾逃至桂林；桂

林有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，劝他参加，他作《癸未春日感赋》：“九鼎铭辞争颂德，百年羸粉总伤贫”，以示讽刺。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。

1948年年底，蒋介石从南京分批派了专机来北京，打算要接一批教授去台湾，陈寅恪、胡适、梅贻琦等均在其中，1948年12月15日他一家与胡适一家同机到达南京，第二天他便匆匆赶往上海，本打算去英国任教，但终未能成行。1953年中国科学院本已决定要他就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，派学生汪篪南下劝说，他对汪说“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，不会湮没”。“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，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，历二十余年而不变。”非常强调“做学问，不应有‘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’这种定语，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。”“我要请的人，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、独立精神。不是这样，即不是我的学生。”

12月1日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里，他特别提出了两个任职条件。要求最高领导“应从我之说。否则，就谈不到学术研究。”这在中国1949年之后，恐再无第二人。他一生践行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、最高的境界，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。而使他最伤心的是，十年动乱中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、诗文稿，多次被抄家洗劫，大字报贴满房屋。一个病体卧床之盲人，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，一批二养。整天还要陷入无人照料，高音喇叭的骚扰、恐吓之中，终于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。45天后夫人也随之而去。

作为中国最博学的人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有独特的见解。1933年在对冯（友兰）哲学史的《审查报告》中有一段：“故自晋至今，言中国之思想，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，”又说“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最深最巨者，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。”“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……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取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，乃道教之真精神，新儒家之旧途径，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他爱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又深知文化传统中专制主义的固疾，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的精神，自由的思想来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，发扬中国文化的精华，并吸取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的真理。

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。通晓多种文字，能够用蒙、藏、满、日、梵、英、法、德和巴利、波斯、突厥、西夏、拉丁、希腊等十几种

文字撰写论文。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，因此无论宗教、历史、语言、人类学、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古史研究，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、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被称为隋唐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。他倡导以诗文证史，在历史科学中开拓了一个新领域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双目失明后写的《柳如是别传》则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，也表达了他对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。若以旧体诗而论，在二十世纪的文人中堪称一绝。著名学者汪荣祖在《陈寅恪评传》中指出：“其诗立意遣辞，远迈异常，其辞藻略似李商隐，其意境略似钱牧斋。”他的诗一是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诗史，让自己的取舍、视角、情感和阐释全都融汇其中。忧己、忧时、忧国、忧民、忧外患、忧内战，忧之深，忧之切渗透进每个字里。二是深刻地感受到文人的“浩然正气”，是一种不降生、不辱志、义命自持、屹立不动的人格精神，标志了现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人格和精神高度，使后学者不能不仰视。

梁启超说的“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，著作算是等身了，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”；胡适说的“寅恪遗传甚厚，读书甚细心，工力甚精，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。今两目都废，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。”，傅斯年说的‘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！’吴宓说的“全中国最博学之人”，‘虽系吾友而实吾师’。皆绝非妄言。

### 陈寅恪在华西坝

1943年底陈寅恪到成都时，初始安家于燕京大学陕西街宿舍。陈先生和夫人唐筼，带着三个孩子，挤住3间小屋，颇为简陋。至1944年夏，早成半盲的陈，须到华大文学院（广益学舍）讲课，又举家迁至华西坝，住“广益学舍45号”，居住条件始有改善。但生活依然艰苦，为使他原本弱质的身体增加一点营养，家中还托人买了一只怀孕的黑色母山羊，生了两只小羊后，夫人学着挤奶，小孩美延负责放羊。当时陈寅恪兼任历史和中文两系，所开课为《魏晋南北朝史》及《元白诗》，后又开《唐史》、“晋至唐史”专题研究两门课。除了上课外，基本上完成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一书。此书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，不是在说诗。穿长袍马褂、手拿黑布包袱，包着书本、讲义，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，步入教室，入座即开课，了无闲言。陈寅恪一面讲，一面板书，不时喝水。陈寅恪早在西南联

大讲授隋唐史，开讲前他就要说明：“前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近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外国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我自己过去讲过的，也不讲。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在华西他依然保持了这种风格。由于他讲课内容独到、精辟，极富启发性，当时慕名前来听讲者，不乏百数人，讲堂座无虚席，待立门窗两旁，几无容足之地。听讲的不仅是学生，华西坝其他大学也有不少教师来听课，当时学术界不少人私下里尊他为“教授之教授”。已为人师的程千帆、沈祖棻夫妇也曾坐在讲堂之下。甚至林山腴先生也前往听讲。金大中文系主任高华先生是每课必听，并详记笔记。1944年5月6日，华西大学、燕京大学、齐鲁大学、金陵大学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校的中国文学系举行联谊大会。学者们公推陈寅恪为大会主席，在这次会上，陈寅恪报告了开会意义，并对五校中文系今后应努力的方向进行了详细的阐述。此间他由英国的Eric Robertson Dodds、Arnold Joseph Toynbee、S. A. Cook三位院士联名向英国科学院推荐，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（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）。就在这年他应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作了《中国的西部通道》的演讲。

他来川后，虽身体欠佳，交往不多，但却十分专注学术，四方搜求四川学者刘咸忻的《推十书》一读，并认为刘30多岁即成就煌煌巨著《推十书》，是蜀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学者，对深研国学的功夫赞誉有加。对德高望重的成都耆儒林山腴则亲自拜望相交。他专程前往爵版街的“清寂堂”林宅拜访，见到林山腴，即以晚辈身份，行磕头大礼（其时，林周围弟子晚辈，已时兴行鞠躬礼），并当众以亲书的一幅对联相赠：“天下文章莫大乎是，一时贤士皆与之游。”真心表达了对林公的仰慕之情。陈先生与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在宥先生交情甚笃，闻先生主持中国文化研究所，特聘他为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。1944年8月，教育部核准吴宓休假进修一年，去向自愿。吴宓由于对陈寅恪的牵挂，与燕大代理校长梅贻宝联系，取得了到燕大讲学的机会。吴同年10月27日来到成都燕大，得以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。1945年的7月末，吴宓欲往乐山讲学，写了一首《赋呈陈寅恪兄留别》的五言诗：“半载清谈接，平生问学心。锦城欣得聚，晚岁重知音。病目神逾朗，裁诗意独深。神州文化系，颐养好园林。”

来成都时，陈寅恪的右眼早已损坏，1944年因劳累过度左眼也于12月12日不能辨视物象，这一天，他正好有课，便叫了长女陈流求去通知校方，今日是不

能上课了。两天以后住进存仁医院治疗。12月18日下午由陈耀真医生给他施治手术，但12月30日“笈夫人秘告：医云，割治无益，左目网膜，脱处增广，未能粘合，且网膜另有小洞穿。”失去了光明。住院期间，同学轮流值班，女生值白班，男生值夜班。既辍讲，仍有研究生二人：中文系刘开荣与历史系刘适（石泉）经常帮助料理事务。代理校长梅贻宝前去探望，陈大为感动，对其曰：“未料你们教会学校，倒还师道有存。”失明给他极沉重的打击，他曾集李商隐等古人句联“今日不知明日事。他生未卜此生休。”请林山腴书写，林老责之：“君自有千秋之业，何言此生休耶！”不能书，且多方慰藉。后仍请友人书写悬于家中。其后经夫人及友人多方劝导，又重新振作起来，重集苏东坡诗句：“闭目此生新活计。安心是药更无方。”请郭守有夫人杨云慧书写，替换了前联。他则开始学习目盲情况下继续工作，以耳代目，以口代手的方式来备课，著书立说。9月13日陈寅恪乘飞机离开成都，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到牛津大学任教。前后在成都一年零九个月。

陈先生失明了，成都便是留在他心中最后的清晰世界。1944年1月31日（春节后大年初七——人日）全家与友朋同游杜甫草堂，出城后他和夫人及小女坐上了“鸡公车”，乃赋《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》记游：“少陵祠宇未全倾，流落能来奠此觥。一树枯桷吹欲倒，千竿恶竹斩还生。人心已渐忘离乱，天意真难见太平。归倚小车浑似醉，暮鸦哀角满江城。”他眼病住院治疗未果，1945年2月12日旧历除夕出院，写下了《甲申除夕病榻作时目疾颇剧离港又三年矣》：“雨雪霏霏早闭门，荒园数亩似山村。携家未识家何置，归国惟欣国尚存。四海兵戈迷眼病，九年忧患蚀精魂。扶床稚女闻欢笑，依约承平旧梦痕。”2月作一首七律诗，题目便是《咏成都华西坝》：“浅草方场广陌通，小渠高柳思无穷。雷奔乍过浮香雾，电笑微闻送远风。酒醉不妨胡舞乱，花羞翻讶汉妆红。谁知万国同欢地，却在山河破碎中。”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后，他对“日去俄来，往复循环”，感触至深，亦有许多诗作。1945年4月陈先生《忆故居》：序：寒家有先人之敝庐二：一曰靖庐，在南昌之西门，门悬先祖所撰联，曰‘天恩与松菊，人境托蓬瀛’；一曰松门别墅，在庐山之牯岭，前有巨石，先君题‘虎守松门’四大字。今卧病成都，慨然东望，暮景苍茫，回忆平生故居，赋此一诗，庶亲朋好友之者，得知予此时情绪也。诗云：“渺渺钟声出远方，依依林影万鸦藏。一生负气成今

日，四海无人对夕阳。破碎山河迎胜利，残馀岁月送凄凉。松门松菊何年梦，且认他乡作故乡。”彰显出寂寞而悲凉，失意有傲气的精神。还有《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》、《玄菟》、《漫夸》等诗篇，感于国家被凌辱的悲愤。1945年8月，日本请降，举国共庆河山光复。先生写了《闻日本投降》一律：“降书夕到醒方知，何幸今生见此时！闻讯杜陵欢至泣，还家贺监病弥衰。国仇已雪南迁耻，家祭难忘北定时。念往忧来无限感，喜心题句又成悲。”在成都举行灯火流行庆祝胜利时，坐落在春熙路的商务印书馆黄馆长邀陈观灯，但目疾不能，劝夫人带两个小孩去，生病的美延和陈留下，写了《连日庆贺胜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婴美延亦病相对成一绝》：“大酺三日乐无穷，独卧文盲老病翁。旧学渐荒新不进，自编平话戏儿童。”感地溅泪，忧国忧民跃然纸上，这正是陈先生在成都写下的诗史。

华西坝亦是先生伤心之地，目盲后先生心中亦隐忍着巨大的痛苦，在56岁生日那天，作了《五十六岁生日三绝》：“一、去年病目实已死，虽号为人与鬼同。可笑家人作生日，宛如设祭奠亡翁。二、鬼乡人世两伤情，万古书虫有叹声。泪眼已枯心已碎，莫将文字误他生。三、女痴妻病自堪怜，况更流离历岁年。愿得时清目复朗，扶携同泛峡江船。”其悲伤与热望同在，令人不忍卒读。

1964年2月在嶺南康乐园的陈寅恪回忆起了成都。依旧还有一首七绝：“昔年人日锦官城，曾访梅花冒雨行。嶺南今朝头早白，疏枝冷蕊更关情。”表达了一种深情的怀念。夫人唐筮，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作《忆成都华西坝寓居》诗：“喜得来游古锦城，花开四季一年春。林园纵好心难静，为有邻家犬吠人。”对华西坝印象颇深。

如今入秋，钟楼下的银杏摇曳着金黄的树叶随风而落，荷塘干枯的荷杆荷叶在月色之下东歪西倒，丹桂飘散出的余香淡淡地沁人心脾，华西坝进入了静谧的天国意境。陈先生亦以其独有的情操载入了历史的画卷，成为知识分子崇拜的偶像，只是不知可否也能继承、发扬他的精神？

参见《百年耀千秋》中《倡独立自由的陈寅恪在华西坝》及《陈寅恪诗集》、陈流求等《也同欢乐也同愁》及陈寅恪年谱